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刘揆一集

饶怀民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刘揆一集

饶怀民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揆一集/饶怀民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25-5

I. ①刘… II. ①饶… III. ①刘揆一(1878~1950) —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58 号

刘 揆 一 集

编者:饶怀民 ①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7.5

字数:270 千字

插页:10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编辑说明

一、刘揆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代理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庶务达四五年之久，几与孙中山、黄兴齐名，曾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过不朽的功勋，本集是为纪念刘揆一逝世四十周年而编辑的。

二、本集根据刘氏各个时期编著、刻印的单行本以及散见于《复报》、《民主报》、《亚东丛报》、《生计》、《震旦》、《民立报》、《政府公报》、《实业杂志》等报刊上的撰著编辑而成。

三、本集各件，一律注明出处，采用原有标题，原文无标题者，则根据内容由编者拟题，文章题目凡有需要说明事项以*号示之。

四、内容编排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原作未署明时日者，经编者考证鉴别，置于相应之处，难于考订而发表于当时报刊者，按发表日期编排，连续刊载数次者，按最先发表日期编排，有年月而无日期者，置于月末，题下和文末出处所标日期均系阳历；但行文中有用阴历者，不予更动，概仍其旧。

五、本集各件，一律由编者重新分段标点，并作校勘。作者原注，以（ ）标明；错字下加〔 〕订正；脱字下加〈 〉补入；字迹漫漶无法辨识者以□标出；个别地方的技术处理以……注明。少数确属明显印错者，则由编者径予改正，不另作说明。

六、原件中凡有史事讹误者，由编者于篇末加注，予以订正，文中某些提法不当之处，因系历史资料，为保留原貌，不作改动。

七、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期间，以工商部名义所发的命令、公文、公电、通告、章程之类，凡有刘揆一署名或与其同事共同署名

者，列入正文；凡无刘揆一署名的其他文件中，其特别重要者，择要辑录，但不列入正文，而附于内容相关连的正文之后，以明事件原委，观其梗概。

八、朱德裳所撰《刘揆一》实系刘氏传记，且其中尚保存有刘氏部分文稿，为保留原文面貌起见，不另将文中所引刘氏文稿抽出，列入附录；其他诸如集主生前友好及亲属所撰文稿，凡具史料价值者，亦列入附录；为方便读者，编者复编撰《刘揆一年表》，一并列入附录。

九、《衡山正气集》是刘道一在领导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牺牲之后，由刘揆一征集的悼念烈士的诗文编辑而成，于1917年刊刻，但未标点；1988年6月，湘潭市政协文史办虽曾选刊，但仍有不少遗漏，为保存史料完整，特重新标点，全部刊出，单独附于书末。

十、由于集主一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常年奔走在外，凡有演说，或讲而未录，或录而未刊；时有所作，散失亦不在少数；仅存的部分文稿复散见于海内外报刊。编者局于所见，且限于水平，遗漏舛误，实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以俟他日增补订正。

十一、本集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的鼓励和指导；林增平先生热诚帮助并为本书题签；刘氏后裔刘孝平、刘孝娥、刘孝嫻、刘孝穉、刘孝媛、刘孝荫、陈佩珉、石昭麟、刘成孔、刘成懿等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惠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唐文权、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沈继成编审为本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本集提供资料或给予工作方便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蔡开松，北京市图书馆景鸿达、杨金南，《求是》杂志编辑部郑伟章，复旦大学陈匡时，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游唤民、周秋光，湘潭师范学院杨鹏程，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李沅汉，湘潭市委党校杨志成等同志。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单位均为本集提供了资料。对于所有支持本集编辑和出版工作的同志们，编者谨致最诚挚的谢意。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为国事操劳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给刘霖生先生写信，向他征询有关党的政策方面的意见。1950年3月14日致刘的信称：“霖生先生有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①一个月之后，即4月14日复刘的信写道：“四月二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大安！”^②同年秋，毛泽东亲自派员到湘潭，邀刘去北京晤谈，可惜由于重病缠身，未能成行。这位与毛泽东交谊甚笃、为毛泽东十分尊重的刘霖生先生就是本集的作者刘揆一。

刘揆一（1878—1950），他的一生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相始终。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他渴望新知，追求真理，早年即与胞弟刘道一留学日本，立志献身革命事业；并与黄兴、宋教仁等筹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嗣又协助黄兴发动著名的甲辰长沙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事泄而流产，但它是内地反清革命团体领导武装起义的

^① 《给刘揆一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76页。

^② 《给刘揆一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

先声；东京同盟会总部成立后，他曾代理黄兴庶务职，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达四五年之久，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昌首义后，他偕黄兴等驰赴武汉，在汉口督战并回湘组织援鄂军，为稳定武汉战局、促成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后，他又“屈身入阁”，担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在不到一年的工商总长任内，他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会议，提出了“工商立国”的理论，制订了保护工商业的计划、法规，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有力措施，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宋案发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败露，他毅然辞去工商总长职，全力投入了反袁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刘揆一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力主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极力提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以挽救民族危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几乎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刘揆一始终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毫无疑问，研究刘揆一不仅能加强对他个人革命历程的了解，而且对于认识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对刘揆一这位“痛苦的革命家”或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有关的历史论著大都略而不论，或语焉不详。编者有感于此，特将1984年以来蒐集到的有关刘揆一的资料重新加以整理，编纂成《刘揆一集》，奉献给读者。

刘揆一，派名刘谦唐，字霖生，又字启后，号培英，祖籍衡山，后迁至湘潭。1878年12月3日诞生于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①。衡山早在南宋时期曾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至明末清初，在衡山又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王船山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传统，在政治上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强暴，宁愿牺牲自我

^① 刘安赓：《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也不向恶势力屈服，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性；在思想上主张追求真理，反对随波逐流，表现出思想上的坚毅性；在行动上主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怕困难，百折不挠，表现出行动上的坚韧性，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坚毅、行动上的坚韧的三者结合，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衡山正气”。刘氏家族长期受“衡山正气”的熏陶，其父刘方峤（字朋远），为人极富正义感，在湘军曾国荃部下服役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放跑过缢城而下的太平天国总制林迪荣，而自己则夺马狂奔逃匿，变名刘耀，隐居于湘潭县白石铺八斗冲。嗣以力大称雄乡里，又被湘潭县衙署雇为“捕快”，奉命缉捕会党首领马福益，他密嘱揆一向马通风报信，使马幸免于难。其弟刘道一领导萍浏醴起义，事败被捕，大义凛然，狱中题诗中有“舍身此日吾何惜，但期吾道不终孤”之句，当清吏施用酷刑时，道一则大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① 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其妻曹庄（守道）闻讯，“匪以头触柱，即引带自经”^②，终至殉节。民国建立，揆一搜集时人有关悼念道一的诗文，编辑成册，题名为《衡山正气集》，这充分体现出湖湘文化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揆一性喜交结天下豪杰，爱打抱不平，平时在言谈中，“对《史记》中荆轲、聂政以及朱家、郭解这类人物的豪侠精神，津津乐道，极为倾慕”^③。

刘揆一幼承庭训，受其父的影响亦很深。其父虽由于家境中落而辍学，然以好学著称，“读书过目成诵”，尝“置书垆畔，或车若担，稍憩，则取书席地坐读，遇难字疑义，不择人择地而就教之，学遂与年俱进”。刘揆一自己回忆：“揆一为时方少，常侍府君，听授史事”，“由是揆一有继承父志之蓄念”^④。

1893年，刘揆一随父迁居湘潭县城，翌年，就读于经学大师王闿运，“处王翁门下数年”之久^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迄至戊戌维新运动，时务学堂等一批新学堂在湘创办，新学风靡一

① 谭延闿：《刘道一传》，《衡山正气集》，1917年刻本。

② 刘揆一：《哀启》，《刘道一烈士》，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③ 刘安鼎：《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④ 刘揆一：《八斗冲墓表》，《刘道一烈士》，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⑤ 章太炎：《与刘揆一书》，《民报》，第十九号。

时，揆一便改治新学，他当时什么书都看，什么新知识都想学到手，他和道一两人互相砥砺，严格要求。据他回忆：“为了苦学博览，我们曾把自己倒锁在房里，可以几个月足不出户，饮食便解都由家里人从窗口送进送出。那时，湖南开风气之先，常有名人来长沙讲学，我们也不怕路远，跑到省里去听讲。”^①然而，戊戌变法毕竟是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而宣告失败，这件事使他悟出了“宜先破坏而后谋建设、欲革政先革命”的道理。于是，他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哥老会党。湖南哥老会向称发达，会首马福益拥众数万，影响及于湘、鄂、赣、闽四省，加以刘揆一父子在危难时曾救过马的性命，马对揆一素以“恩哥”称之，刘、马两家遂有生死之交，他便“密与马福益通”，通过马的介绍，揆一还结识了其他哥老会头目，并以“兵法部勒之”，使广大哥老会众渐就其范围，因而受到会众的“推重”^②。这就更加增强了他从事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00年唐才常借助会党力量拟在汉口发难，揆一积极参加了起事的预谋，按照原拟的计划，揆一与唐才常的弟弟唐才中“共担任湖南南路事”，事甫发而败，唐才常等二十多名自立军志士惨遭杀戮。自立军起事的失败再次给揆一以新的刺激，这无疑是在促成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

1903年3月，在留日热潮的鼓舞下，刘揆一自备资斧，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他结识了黄兴，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的途径，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③。留日期间，他和黄兴、秦毓鎰等发起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带有排满革命性质。清公使请求日政府禁止，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揆一曾在该会“学过军旅之事，参加过行军、射击的训练”。黄兴从宏文学院毕业后，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决定归国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临行前，垂询揆一革

① 刘安肃：《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② 朱德裳：《刘揆一》，木刻单行本，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③ 刘安肃：《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命进行方略，揆一答称：“言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①

此时，揆一尚未毕业，遂与黄兴相约，过三个月后在长沙相会。

二

1903年11月，刘揆一自宏文学院毕业后回到长沙，便和黄兴一道开始倾全力策动武装反清斗争。

是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他们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秘密聚会，黄兴、刘揆一等十二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筹备成立华兴会。翌年2月15日（阴历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公举黄兴为会长，刘揆一等人为副会长，刘在副会长任内，“实心任事，不计劳怨”，“领其事者虽为克强，而会中一切之计，则先生（指揆一——引者）独尸之”^②。华兴会很快发展到数百人，黄兴考虑到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与会党中人接洽颇多隔阂，乃与揆一商量，别创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构，容洪会党人参加，以便合作，并“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③。华兴会及其外围组织同仇会的建立，使湖南革命党人不仅有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总机关，而且有了专事联络会党的总机构，这种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使分散在湖南各地的会党徒众很快统一起来，纳入革命的轨道，成为此后甲辰长沙起义、丙午萍浏醴起义、庚戌长沙抢米风潮的主要动力。这的确是湖南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它充分反映出湖南革命党人的斗争艺术和独创精神，它使湖南革命党人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对全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期。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第153页。

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华兴会成立伊始，便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刘揆一决定回湘潭一趟，以期与雄踞一方的马福益取得联络，他和黄兴商量，先遣其弟偕会党成员万武前往湘潭，敦劝马福益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由于刘道一革命思想纯正，又能言善辩，使马为之折服，初次见面，便慨然相许加入革命，并当即表示：“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①接着便有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的戏剧性会晤。1904年初春的一个雪夜，刘揆一偕黄兴短衣钉鞋，乘雪夜行三十里，与马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中，三人席地而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并拟定了甲辰长沙起义的计划，定于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外分浏醴、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进攻，并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回长沙后，黄兴旋即派员分赴鄂、赣、沪、宁、川等地联络布置，以谋响应。刘揆一应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之聘，前往任教，他一方面以教育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至即提倡革命，血忱动人，学生最为倾服”^②。另一方面，又暗中促成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伺机起事。其时，由于经费奇绌，“揆一破产并告贷约四千余金”，加上黄兴、柳大任、彭渊恂、龙璋、杨守仁等共筹得二万三千余金，“即以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计可集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枝，以资分配”^③。

湘潭茶园铺会晤后不久，黄兴致书马福益，并赠以白马一匹，酒、肉、布匹若干，密派刘揆一骑马先行，由张平子、万武雇一小船，押运各项礼物前往湘潭雷打石，揆一向福益传达了黄兴的意旨，“大意是要他从速将会众编练成为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

① 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1年，第246页。

② 朱德裳：《刘揆一》，木刻单行本，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③ 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